



主 编·王能宪 陈骏涛
副主编·庞 洋 郭锦华

著名
文学家
采访录

王能宪

王能宪

足迹

著名文学家采访录

主 编 王能宪 陈骏涛
副主编 庞 洋 郭锦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足迹：著名文学家采访录 / 王能宪、陈骏涛主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008 - 4843 - 1

I. ①足… II. ①陈…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
现代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0107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120

电 话：(010) 62350006(总编室) (010) 82075935(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 6200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1.75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足迹》编委会

主 任：王能宪

副主任：庞 洋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能宪 李建平 陈飞龙

陈骏涛 庞 洋 周 岩

郭锦华

编 务：白 荔

序：三十年，文学的行进足迹

陈骏涛

2008年岁末，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题为《难忘1978年》的短文，开头是这样说的：“1978年这个年份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我人生历史的一个新起点。”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十年“文革”耗费了我最宝贵的年华，1978年我已到了古人所说的“不惑”之年，但回望过往的岁月，不过是一片空白，此时我有一种强烈的焦灼感和紧迫感，总想找回那失去的年华，于是产生了一种重新书写自己历史的迫切愿望。我此后的三十年历史，正是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一起走过来的，其间不乏磕磕绊绊，但也确确实实是我“人生历史的新起点”，尽管这个“新起点”来得太晚了，也没有作出多少值得说道的成绩。

因此，当我读到《足迹》中不少作家谈到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感受，以及这个时代对他们创作道路的影响时，也深有同感。中国当代许多优秀的作家，特别是中老年作家，他们的创作经历都与改革开放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贾平凹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就是我个人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代痕迹在我的作品中都能找到。”铁凝也说：“我的写作，我的成长，我作为作家的成长，是伴随着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这是确确实实的，不独贾平凹和铁凝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作品都是先验地、刻板地去反映和表现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和事，而是说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学观念受到了改

革开放时代的洗礼，终于能够挣脱种种枷锁和束缚，从而进入了一种比较自由的创作境界，去抒写自己所想写的东西。

于是，年逾八旬的老作家宗璞将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大历史的波澜壮阔相汇合，“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以十五年的岁月，写出了长篇巨著“野葫芦引”的前三部——《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第四部《北归记》正待写中。“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能坚持？其实也简单，就是要留下生命中值得记忆的、可珍藏的，而且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一段历史。春蚕到死，蜡炬成灰。”宗璞如是说。

比起拖着病体，与“一支秃笔长相守”的宗璞来，王蒙则要洒脱得多。他1979年落实政策从新疆回到北京以后，三十多年来，从最初的《风筝飘带》到《坚硬的稀粥》再到《活动变人形》，从评点《红楼梦》到演绎孔孟老庄，直到小品文集《老王系列》，都在文坛上闹出了动静。可以说，他的创作是真正进入了一种自由的、丰富多彩的境界，年逾古稀的王蒙又焕发出了青春的朝气和活力。

比宗璞和王蒙晚一辈的蒋子龙、陈忠实、唐浩明、梁晓声等人，也同样接受了改革开放大时代的精神洗礼，在这三十年里，从中年跨入了老年。尽管蒋子龙并不喜欢“改革文学”这一命名，但他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说他是“改革文学的开拓者”也名实相符。从《乔厂长上任记》到《农民帝国》，从城市写到乡村，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现实，也许是巧合吧，历时也正好是三十年。陈忠实和唐浩明则将目光投向了历史。陈忠实书写的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历史，这无疑受到了上一辈作家柳青和王汶石的影响，但他又能摆脱或者超越柳青和王汶石的局限，从而使他的《白鹿原》成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经典。唐浩明书写的是晚清的一段“徐图自强”的历史，《曾国藩》《杨度》《张之洞》是三部很有功底的力作。对近代文献的熟稔和对历史人物的形象刻画，特别是对晚清这一特定历史时段知识分子心灵、命运的深入体悟，奠定了他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的地位。梁晓声与共和国同龄，从“知青文学”起家，文学历程几乎与“新时期”同步，作品涉及小说、散文、杂论、影视等多个领域。他对作家的定义是“时代的书记员”，并声称“把希望寄托在民间”，反映了这一代人中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文学观。

“50后”和“60后”作家，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在“70后”和“80后”还没有完全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时候，“50后”和“60后”无疑是当今中

国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刘庆邦、毕淑敏、贾平凹、徐小斌、王安忆、刘恒、方方、莫言、何建明、铁凝、严歌苓、苏童等人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部分代表，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当今中国最具实力的优秀作家的代表。尽管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同，文学观念和创作追求也有不少差异，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大体是趋同的：

其一，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他们都是从“新时期”（或前或后）开始写作的，是“新时期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莫言），也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以文学的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历史、社会、人生等诸多问题的看法。

其二，为什么写作？写作是他们生命的需要，“不仅是心理上的需要，也是生理上的需要”（刘庆邦）。“对我来说，写作是自然和快乐的事，几乎是生理的需要”（严歌苓）。因此他们热爱写作，“这种喜欢就好比是信仰，相信里面存在着一个极好的世界因而渴望进入”（王安忆）。

其三，写什么？怎样写？“我写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是我惦念的男人和女人，以及活人和死人，我写的是我自己”（刘恒）。“我写作只按我自己的内心需要去写”（方方）。关注的对象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转变为“关注人的问题”（贾平凹），并且认为“任何作品，凡是能留下来的，应该是关照人性或者对于文学艺术有突破性、创新性的写作”（严歌苓）。

刘庆邦的创作领地始终没有离开过煤矿和农村，并孜孜于构建他的短篇小说王国，有短篇小说“圣手”之称。毕淑敏起步虽晚，但后发制人，她的创作始终离不开“昆仑山情结”和“白衣情结”，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些为读者所看好的作品。贾平凹既涉足农村也涉足都市，但涉足农村的作品似乎更为人们所称道，《浮躁》《秦腔》《高兴》等众多作品，从文学语言到艺术风格，都造就了“这一个”无可替代的贾平凹。徐小斌“特立独行、以血代墨”，在女作家中独树一帜，《双鱼星座》《敦煌遗梦》《羽蛇》《德龄公主》等既有丰沛的想象力，又富含文化内涵。王安忆三十多年来不倦地坚持写作，同时也不断地刷新自我，《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纪实和虚构》《长恨歌》……构成了一串作品的长廊，影响深广。刘恒在小说和影视两个方面都有不俗的业绩，从《狗日的粮食》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及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等，都深得人心。方方也是一位不倦的耕耘者，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以洒脱大气名世，兼

具冷峻、深沉、轻松、热烈等多种色调。莫言是最具有东方色调和地域特色的作家，同时也是被国外汉学界十分看好的作家，东方传统艺术资源和西方小说艺术元素的奇妙结合，造就了莫言独特的艺术风格。铁凝依靠从《哦，香雪》到《玫瑰门》再到《笨花》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跻身文坛，“文学要给世界以温暖，给人生以体贴”反映了她的一种文学观，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成熟作家的文学理想追求与社会担当。严歌苓是海外作家的杰出代表，出国以后，就不间断地以别具特色的新作，引发海内外读者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以女作家的细腻书写着女人的情感史。苏童是这些作家中最年轻的，也是先锋和新锐的，以他丰富而瑰丽的想象，构筑了一个自在的文学世界，他的成长史也同样镌刻着这个时代演进的印迹。

以上作家大都偏重于小说创作，唯有何建明是个例外——专事报告文学写作。这不是说在我们的土地上报告文学是凋零的，恰恰相反，我们的报告文学是丰茂的，而且有不少很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只是其中的一员，当然，是很出色的一员。“我是歌手，假如我不歌唱，我还能有生命吗？”这是何建明的心声，事实上也是我们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心声。

正是这些文学理想、创作追求、艺术理念、艺术风格不同的作家，构成了三十多年来丰富多彩、绰约多姿的文学世界。

循着三十多年文学行进的足迹，我们感念那些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书写这段历史和生活的、分布于各个领域的作家，也包括那些已离开人世的作家。刘绍棠就是其中的一位。他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以后，就从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忘我地投身于“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建构，为当代乡土文学作出了贡献。评论家郑恩波的回忆，将引发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当代乡土文学领军者”的追求和业绩。

诗歌是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思谋变革，冲击极限，为诗歌创作赢得自由，为文学百花园多有增色。诗评家吴思敬以他敏锐的感悟和翔实的研究，为我们梳理了诗歌三十多年的纪程，它的潮涨潮落，以及重要的诗人和诗作。

军旅评论家朱向前则以切身的经历、体验和研究，对三十多年来军旅文学的历史进程和重要军旅作家的创作作了高屋建瓴的评述，对我们认识这一特殊作家群落对三十年文学的贡献大有裨益。

环顾当今文坛，确实是复杂丰富、气象万千，与三十多年前“文革”时

期几近凋零的文坛相比，简直是两重天地，不可同日而语。文学终于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单调走向了丰富，从本土走向了世界。当然，毋庸讳言，问题很多，矛盾很多，悖论很多，难以解开的结子很多，所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精品和垃圾并存，鲜花和杂草共生，生机和危机同在……这些恐怕都是事实。时代向前发展了，时移世易，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也产生了急剧的分化，不再是单一的教化功能了。又何况在一个商品拜物教畅行，市场意识和市场行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年代，文学要想保持自身的纯洁，又谈何容易！在一个多元共存、众说纷纭，一个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平等竞争的年代，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是怪事呢！

近年来，对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一直是文坛上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问题。从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当代中国文学“垃圾”说，一直到新近的“当代文学在走下坡路”、“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等种种的言说，否定当代文学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实际上，对当代文学评价的分歧由来已久。远的可以一直追溯到1986年，在“新时期文学”十周年的时候，就有危言耸听的“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论。其后是1998年，又有《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其部分论者显然有些失控地对现当代文学的一些经典作家和整个当代文坛进行了一场无所顾忌的扫荡。两次否定，都引发了一阵骚动。今天对当代文学的否定，也可以说是以往否定之声的延续和发展。尽管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之中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离时代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值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真正伟大的、经得起历史淘洗和时间检验的作家作品还难以寻觅，但问题还是被论者夸大了。就论者的局部论点来说，也许不无道理，但从整体来看，他们的观点都过于极端，过于片面了，是以局部替代全体，以低端取代高端，将“垃圾”与“黄金”相提并论，以情绪化的言说冒充科学求实的批评。当代中国作家用自己的辛勤的劳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他们视创作如自己的生命，在当今世界，他们应当被列入最有创造性的作家的行列，只是这种创造性以往被压抑了，如今才得以释放，现在还正处在这种释放的过程之中。应该承认，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是蕴藏着巨大的潜力的，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其聪明才智并不弱于西方的一些获“诺奖”的作家，有些优秀的、富于独创性的作品即使拿到世界上去，也是毫无愧色的。当然，在这庞大的作家队伍中，也是良莠不齐、高低有别的，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垃圾”和赝品也不在少

数，有些作品可能风光一时，但犹如过眼烟云，稍纵即逝，这是任何朝代、任何国度都存在的，不独当代中国如此。怎么可以单凭个体的美学趣味和批评标尺，特别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西方人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定是非呢？为什么东方人就不能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呢？

当代文学的发展除了要排除自身的种种问题以外，还要应对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导致的文坛的新变化，在这种新变化的情势下，文学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这方面，评论家白烨以他对文坛持续的跟踪研究，提出了有创意的文坛“三分天下”的论说，并对这三大板块作了辩证的分析，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

不过，无论文坛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我依然相信，文学，特别是所谓的纯文学，或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全球化、市场化，高科技的发展和电子时代的来临，已经并将继续引发文坛的急剧分化，但纯文学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并不会就此消亡。一个民族文学的传承，不是依靠那些短命的、满足人们一时感官和欲望需求的浅层次的文学，而是依靠那些富于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魅力的，能够引发人们深度思索的，对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产生持久影响力的高层次的文学，而这非纯文学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莫属。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作过于悲观的估计，是失之片面的，也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对它的未来，我依然充满信心！

2010年4月3日写，16日、18日改于京东南隅从心斋



目 录

序：三十年，文学的行进足迹 / 陈骏涛(1)

宗 璞 当代文坛的常青树 / 吴舒洁(2)

王 蒙 青春永驻 / 王 童(14)

蒋子龙 改革文学的开拓者 / 杨 鸥(34)

陈忠实 天生一副作家心 / 郅科祥(46)

唐浩明 文学是时代变迁与精神发现的通道 / 赵树勤 龙其林(60)

梁晓声 世上自有真情在 愿将温暖洒人间 / 郑恩波 郭锦华(70)

刘庆邦 根深叶茂 / 郭锦华 李建平(84)

毕淑敏 关注生命 / 杨 鸥(96)

贾平凹 作家必须关注时代 / 郅科祥(108)

徐小斌 特立独行 以血作墨 / 杨 劫(120)

王安忆 三十年的写作历程 / 张新颖(132)

刘 恒 感悟与实话 / 苏 彬 郭锦华(162)

方 方 “阅读也是需要训练的” / 姜广平(168)

莫 言 三十年的浓浓故乡情 / 周 昱(190)

何建明 国家叙述 30 年 / 舒晋瑜(202)



铁 凝 “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没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 刘 颀(216)

严歌苓 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 / 舒晋瑜(240)

苏 童 “留神听着这个世界的动静” / 姜广平(250)

刘绍棠 当代乡土文学的领军者

——郑恩波回忆刘绍棠 / 郭锦华 李建平(272)

吴思敬 诗路纪程三十年 / 王士强(286)

朱向前 军旅文学三十年 / 李墨泉(306)

白 烨 当代文学的演变与新兴板块的崛起 / 杨 劫(322)

后 记 / 编者(337)

宗璞

女,原名冯钟璞,1928年7月生于北京。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曾任《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刊物编辑。1981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我是谁》《蜗居》,中篇小说《三生石》,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系列(《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散文《西湖漫笔》《三松堂断忆》等。其中,《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长篇小说《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宗璞

宗璞 当代文坛的常青树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常青树,宗璞先生年逾八旬仍然笔耕不辍。在人心浮躁的今天,她的写作更像是某种象征,那是一代人的坚守,也是历史文脉的相承相传。宗璞先生曾这样描述他们那一代人:“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童年,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满怀热忱地燃烧了青春,在以后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无尽无休的各式运动中,过早地花白了头发。”历史的痕迹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叙述和书写中。他们将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历史的波澜壮阔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我们热爱宗璞先生的作品,也渴望了解作品之外的宗璞先生——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多年时间里,她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体悟,又拥有着怎样的属于她自己的历史。

吴舒洁(以下简称“吴”):1978年春天,您写了《弦上的梦》,此前,您已经搁笔十五年,能谈谈您从搁笔到重新拿起笔写作的一些情况吗?当时“四五运动”还没有平反,写这篇小说会不会有什么压力?为什么会选择梁遐这样一个“‘文革’中成长的孩子”来写?当时的“伤痕文学”像《班主任》《伤痕》这样的作品,都选择了在“文革”中遭受创伤的年轻一代作为书写对象,您觉得这是否是一种共同的呼声?

冯钟璞(以下简称“冯”):《弦上的梦》是我以“文革”为题

材的第一篇小说,当时开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觉得精神获得了解脱,写的都是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当时,有人批评这篇小说的结尾有点概念化,尤其外国人读起来觉得不能接受。其实,我写的梁遐这个孩子还是比较真实的,因为有一个模特儿。我有一个亲戚就是梁遐这样的人,这个亲戚当时并没有参加“四五运动”,是我给提高了。当时觉得这些孩子挺值得同情,她们(他们)在最需要父母教育和关心的时候,被逼迫与父母划清界限,被迫把父母当成敌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可是她们(他们)都经受过来了,而且这些孩子没有变坏,都在逆境中挣扎出来了。那个年代、那样的事情是很荒诞的。当然荒诞的事情非常多,我写的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吴:此后,您写了一系列的表现浩劫过后知识分子反思和内省的作品,如《蜗居》《我是谁?》《米家山水》等,这些作品虽然也有撕肝裂胆的控诉,但是更有一种温情,就像您笔下的铁箫的自况,“铁质硬于石,箫声柔如水”。我觉得这种气质和其他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品很不一样,这种温情是不是表达了您对历史的某种宽恕和出于某种信念?

冯:我觉得在历史中普通人是比较多的,而真正的英雄人物是比较少的。英雄人物当然值得敬仰、值得歌颂,就像我在小说中写的那个举着自己的头颅的队伍,这是人类当中的精华。我觉得普通人应该尊重那些人,理解那些人,如果自己做不到的话。可是普通人还常常骂那些人,去批评那些人。这是就知识分子而言。我发现真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芸芸众生”,不怎么想事情。他们当然也很可爱,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能要求他们都一样。我觉得我就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英雄。所以,我会认同像慕容乐珺这样的普通人,她能够理解勇士,但也会有犹豫。《蜗居》这篇小说也只是启发人们起来反抗,不是号召,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反抗。

吴:您曾经谈过,《三生石》中感觉特别深刻的,是人的心灵从“铸心”到“心硬化”的这样一种改变,那种相濡以沫的情谊特别让我们感动,友情、爱情对于您这一代经历过历史残酷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冯:在《三生石》中我提了“心硬化”,那是我感觉特别深刻的。从“铸心”——思想改造——到“文革”,大家已经没有心了,心都变成石头了。“心硬化”比肝硬化更可怕。后来才慢慢醒过来一点。现在,很多人也不是完全能够认识到怎样做一个、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这还需要教育。而友情是人伦中很重要的构成部分。中国传统是很注重友情和朋友的,友情和爱情差不多是并重的。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常青树”，宗璞先生年逾八旬仍然笔耕不辍。

我写过一篇散文《孟庄小记》，里面讲到我和蔡仲德去寻找三生石，就讲到朋友和友谊。梅菩提和方知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我觉得他们应该原来就认识，好像冥冥中注定的事情。我很喜欢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我没什么研究，可是觉得很有意思。当

时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安排，但我改了一下，觉得不对，就又改回来了。有些现实中不可能的情节，反而能让小说更有想象力，更光辉。

吴：您在《三生石》中写到爱如何能救治“心硬化”：假如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大的有机体，只要有一些细胞活着，还有爱，这个社会就能变好。您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

冯：希望能活过来。不过现在我有点悲观，好像人都变得很实际。我觉得文化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比如，我们的古典诗词和一些外国诗歌，我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念的，我们觉得那真是非常好的东西。小说也是要静下心来读的，现在能静下心来的人不多。比如说《南渡记》《东藏记》，像你这样耐心地看第二遍的人恐怕不是很多了。

吴：评论家李子云女士曾经用“兰气息、玉精神”来形容您的作品，我觉得《三生石》就特别能体现您的这种风格，追求“诚”和“雅”的精神气氛。所以，虽然这篇小说不是那么紧凑，但还是非常打动人。这种气质别的作家很难具备。

冯：原来构想《三生石》是个短篇，后来觉得短篇容不下这样多的人物变化，就写成了中篇，但我觉得再压缩一些可能更好。气氛有很大部分是语言上的功夫，文学究竟离不开语言。我的中国文学有一些底子，但光靠底子就容易不新鲜，后来又加入了西洋的东西——我大学念的是外文，后来一直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当编辑。语言是心之声，不是形式，不是能刻意追求的，而是靠内在的修

养。“诚”和“雅”是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歌理论,后来郭绍虞先生将之总结为“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没有真性情,写不出好文章。但要做到“诚”,就要能够正视生活的很多问题。“雅”便是文章的艺术性,这只能靠改,不厌其烦地改。

吴:您曾经将自己的写作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外观手法”,一种是超现实主义的“内观手法”,为什么会有意识地用两副笔墨写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现代派”是个很时髦的词,电影、绘画、文学各个领域都在争先恐后地学“现代派”。我记得您参加过一个《文艺报》组织的“文学表现手法探索笔谈”,您对形式上的创新还是比较鼓励的?

冯:“外观手法”主要是根据生活反映现实的写实主义手法,比如《红楼梦》里写了几百个女孩子,而能各有个性不重复,因为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了很多的女孩,是有根据的。我写的《三生石》《弦上的梦》《红豆》就是属于“外观手法”的。另一类“内观手法”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看本质,虽然荒诞不经,但求神似。我受到卡夫卡的启发很大,他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重要的。写作手法是为内容服务的,怎样写要依内容要求而定。其实“内观手法”也和中国传统艺术的关系很大,中国画讲究“似与不似之间”,这个对我启发也是很大的。我也有一些作品是把“内观”和“外观”糅合在一起。

吴:《我是谁?》应该是受《变形记》启发很大的吧,这篇小说是较早运用意识流手法的“现代派”小说,技巧比当时其他一些“现代派”小说都要成熟,开风气之先,影响非常大。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用这种比较大胆的手法来写作?

冯:因为工作关系,我在60年代就接触到西洋现代文学,卡夫卡、乔伊斯的作品都读过。1979年王蒙用意识流手法写了《风筝飘带》,写得很空灵,又很有内容,不是白描,也不是一件件事的叙述。这使我了解到创作可以有很大自由,我觉得可以有重点地去写,更生动。《我是谁?》的直接触发是看到叶企孙先生在校园食堂打饭,他是中国物理学的泰斗,成就很大。我却看到他弯着背,身体不好,单身没人照顾,在“文革”中被折磨成那样,简直像一条虫,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觉得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我想表现的东西。“文革”就是对人的践踏,整死了还不满足,必须要折磨,折磨到你不像人,不成为人。看到叶先生像条虫,又看到有人自杀,我就写了《我是谁?》,答案是